

T H E O R I A 2 0 0 7

年度学术 2007

「治 与 乱」

Order and Disorder

犀锐系列
XRAY SERIES

主编 赵汀阳

学术指导 费孝通 吴敬琏

《年度学术》是每年一期的大型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集，有选择地收录一年以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各主要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意在搭建一个有责任感的中文学术表达平台，推动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发展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ORIA 2007

年度学术 2007

治 与 乱
Order and Disord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度学术 2007:治与乱/赵汀阳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犀锐系列)

ISBN 978-7-300-08525-8

I. 年…

II. 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治安管理—综合治理—中国—文集

IV. C53 D63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416 号



犀锐系列

年度学术 2007——治与乱

赵汀阳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36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3 000

定 价 3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总策划 皇甫炳君

主编 赵汀阳

特邀联合主编 呼延华

学术指导 费孝通 吴敬琏

学术委员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汪晖 清华大学教授

甘阳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课题策划和研究支持 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前 言

本集主要从政治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角度去讨论目前国际学术热点的“治理”问题,涉及世界政治、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概念,就是关于治与乱的系列问题。特邀请国内外各学科著名学者写作,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黑龙江大学校长衣俊卿、意大利思想大师艾柯、德国柏林科学院院长葛理墨、联合国教科文哲学主席车仁锡、欧盟主席顾问泰罗等。希望大家喜欢。

北京犀锐文化中心

目 录

（188） 世界主义视角下的欧洲 104

治乱理论

（188） 欧洲之朝向一种权利导向的法律文化的发展 53

（188） 正义与团结：欧洲身份认同的灵魂 61

安伯托·艾柯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 (3)

车仁锡 朝向一种为伟大的共同体服务的跨文化伦理学 (17)

赵汀阳 冲突与合作的博弈哲学 (27)

郝 士 战争与秩序 (46)

关于欧洲

葛理墨 欧洲之朝向一种权利导向的法律文化的发展 (53)

马里奥·泰罗 正义与团结：欧洲身份认同的灵魂
——从历史根源到“里斯本战略” (61)

德兰提 贝克 世界主义视角下的欧洲 (104)

关于美国

张宇燕 美国行为的根源 (121)

克雷·G·莱恩 美国与自己的战争：新雅各宾帝国主义 vs. 立宪主义 (188)

关于俄罗斯

许志新 崛起中的俄罗斯：目标、机遇和挑战 (207)

关于日本

韩东育 朱舜水在中日之间的微妙作用 (261)

微观治乱问题

衣俊卿 论微观政治哲学 (329)

托姆巴 北京住房纠纷中居住空间和集体利益的形成 (340)

刘 淳 道德如何评价市政工程? (355)

刘春荣 另类的邻里动员:关键群众与社区选举的实践 (378)

治乱理论 ▶▶▶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关于治/有序与乱/无序的种种观念,是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种种观念严格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神话中,人类最初的状态都被想象成是一种秩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被保存到人类的未来之中。这种秩序的状态就是所谓“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是人类与人类,而且人类与动物也处在一种和平的关系之中。而如果说战争被看成是某种暂时性的无序的话,那它也总是被理解成是,其目的在于恢复那被破坏了了的有序状态,或者,是为了把秩序,胜利者的秩序加诸于无序,即由那些发生冲突的民族或者部落所代表的无序身上。

正如我们待会儿将会看到的,我们的过去是否真是如此,这其实是非常可疑的。而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描述显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所以,我下面想要说的,是关于在过去的十七年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是如何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的。很明显,我将以我自己——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自己——的经验和反思为基础来说这件事,而且,很遗憾的是,我不能提供关于中国的例子和分析。不过我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变成一种对于每种文化、每个国家都完全相同的问题了。

在过去的十七年间,关于各种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战争,我曾经写过很多的文章:从90年代的海湾战争到现在的伊拉克战争。而如果我现在回过头去再重读这些文章的话,我会发现,在每一篇文章中我都不得不改变我关于到底什么是战争,或者战争在今天到底应该是什么的观点。这倒不是因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如此频繁地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而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战争的概念本身正由于演化着的环境而一步一步地发生着改变。战争的概念,虽然直至昨日它都还多少保持古代的样子而基本未变(尽管人们所使用的武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过去的十七年间,它却至少发生了三次变化。

从古典战事到冷战

在过去的那些世纪中,被我称为“古典战事”(classical warfare)的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开启战端,是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并从他们的失败中获得利益;我们通过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无所不用其极,以保证我们敌人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接受一定程度的生命损失,目的是迫使敌人损失比我们更多的生命。

尽管这些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前提条件:古典战事需要知道敌人是谁,以及敌人在何处。而正因为这样,通常来说,冲突是以一种正面交锋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被卷入冲突的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识别的领地。这个游戏在两个对手之间展开,而其他的中立方则是交战方得以自由行动的必要条件。

这种形式的古典战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时遭遇了第一次危机。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一场将整个星球卷入其中的战争里,即使是那些过去从无纠葛的社会(比如波利尼西亚部落)也被卷进来了,而这样的一种情形使得中立方与交战方的区别完全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原子弹的出现则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原则:不管对手是谁,核能会毫无疑问地让整个地球受到伤害。

这些现象导致的后果,就产生了某种从古典战事到后现代战事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就是冷战。冷战建立起了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交战者的和平”或者“和平的交战状态”的东西,这是一种恐怖与恐怖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保证了西方和东方世界的中心可以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稳定状态,而其代价却是在两个世界的周边地区(越南、中东、非洲国家等)的一系列不间断的古典战争。这样一来,以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周期性的或者地方性的冲突为代价,冷战保证了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和平。

海湾的后现代战事

苏联解体结束了冷战,但却留下了世界许多地区无休止的冲突问题让我们去

面对。在1990年,随着萨达姆的军队对科威特的入侵,似乎情况已经到了必须回到古典战事的状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时用来与萨达姆的入侵作比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情况:如果希特勒在入侵波兰之后就马上停下来……)。但是,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楚起来,战争已经不再是(或不只是)发生在两个相互分离的前线之间了。这样一来,海湾战争就成为了后现代战事的第一个范例。

后现代战事的特征是什么?

敌人的身份并不确定。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是法西斯意大利与希特勒德国结成联盟对抗法国和英国),电台里的战争宣传曾经用过这样一种口号“Dio stramaledica gli inglesi!”——也就是,愿上帝诅咒所有的英国佬!意大利人就应该对所有的英国公民采取一种仇视的态度,同样,美国人也应该恨每一个日本人,反之亦然。相反,在海湾战争中,西方国家却不应该仇恨每一个伊拉克人,可恨的只是那个独裁者还有他的追随者们。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军事力量会使用精确制导炸弹的原因——而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战争不是前线交锋。一场后现代战事不可能以前线交锋的形态出现,其原因在于跨国资本主义的本性。事实上,塔利班和萨达姆都曾经由西方提供武装,这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所落入的是成熟资本主义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成熟的资本主义会摆脱国家的控制。而且,有一个虽然细微但却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在海湾战争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西方认为他们的飞机成功地摧毁了萨达姆坦克部队的一部分,可结果却发现,这些坦克完全是假的;而且,这些诱敌物还是由意大利的工厂生产并且合法地销售给萨达姆的。

古典战争会让交战各方的军火工业获利,而后现代战争却开始让跨国资本获利,他们在战壕两边都有利益(如果还能真有战壕的话)。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古典战事养肥了军火商,而且这种收益会使其他贸易形式因为暂时的停顿而蒙上阴影的话,那么对于后现代战事来说,尽管它养肥了军工产业,但它同时也让全世界的空中运输、娱乐业以及旅游业陷入危机。媒体损失了广告收入,而且,一般来说,全部依赖过剩消费的产业(industry of superfluous),从建筑部门到汽车工业都陷入了部分的瘫痪——而这些产业却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柱。后现代战事把某些经济力量带入了与其他经济力量相互竞争的状态,与此同时,它也使这些经济力量之间的对抗逻辑压倒了国家权力运转所遵从的逻辑。

正因为这样,海湾战争就必须是一场短期战争,因为如果它拖下去的话,到最

后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但是,对于后现代战事来说,国家的逻辑不仅必须服从于跨国资本的产业逻辑,它同时还要服从于信息产业的需要。在海湾战争中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见证到,西方媒体不仅传达出了西方自己的和平主义代表(首先和最主要的是教皇)对此事的保留态度以及抗议的声音,甚至连那些支持萨达姆的阿拉伯国家的大使和记者的保留态度和抗议,也可以从西方媒体那里听到。

所有的古典战事,其目的都在于阻挡敌人的战争宣传,而且,古典战事理论的最重要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过,胜利的条件之一就是一个国家中全体人民的凝聚力——无论是平民还是战士。但是在海湾战争中,信息服务部门却持续地允许敌对方发言,这降低了各方对他们自己政府的信心,从而降低了这些公民的士气。

所以,媒体让敌人出现在我们的后方。在海湾战争中,这样一条原则被建立了起来:在一场后现代战事中,每个人都有藏身后方的敌人。在过去,潜在的敌人会被监禁(或者屠杀),而那些从敌占区过来为敌人说话的同胞,则会在战争结束后被绞死,就像发生在 John Amery 身上的情况那样,他在法西斯电台里攻击他自己的国家(英国);而一个亲法西斯的美国人,庞德,他之所以能逃脱死刑,只不过是因他被证明有精神病而已——即便如此,也还得感谢他那伟大诗人的声誉,以及各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支持。

但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不仅有 Peter Arnett 这样的美国记者站在巴格达的立场上进行报道,而且那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亲伊拉克的穆斯林也会出现在电视上支持萨达姆。而且,就算媒体被封上了嘴,也还有新的通信技术,后者可以保证信息不间断的流淌。这种信息承担了,而且以后也还会承担着古典战事中秘密情报机构所发挥的功能:它让任何出乎意料的行动都成为不可能——而如果你不能出乎你的敌人的意料,那也就没有什么战争了。后现代战事将 Mata Hari 的角色(间谍)机构化了,而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种一般意义上“情报资敌”(intelligence with the enemy)。

由于后现代战事把如此之多的权力都拖入了战争游戏之中,它就已经不再是参与其中的主要行动者的算计和意图能够拥有决定性价值的战争。这种权力的多样化或者说增殖(我们实实在在地正处在全球化的开端)意味着它们会以一种不可预料的方式散布。而结果就是,尽管有可能战争到了最后所达成的秩序会对敌对各方中的一方有利,但,从原则上说,后现代战事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后现代战事中没有赢家。说某人在某个时刻某个冲突中占到了便宜,并不是说这个“在某个时刻”占到的便宜到最后就真是便宜。不仅如此,如果战争还仍然是(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延续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还存在这样一种最后时刻,即作为终点的最后时刻。而在这一时间点上,战争将会因为胜利者达到了某个均衡点,即那种允许他在政治上获得回报的均衡点而结束。但是,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已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战后政治永远都是(通过各种手段而)对那些由战争所提出的前提的延续。无论战争是怎样进行的,它都会产生这样一种一般认识:它并不能与各方对手的意志完全相应,所以它都会在它结束以后以另外的形式继续进行,直至新的战争出现。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从意大利到德国到巴尔干地区的法西斯军事政变,就是西班牙战争之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冷战。

除此之外,难道在过去情况就真的不一样吗?认为古典战争所产生的是一种理性的结果,是一种最终的均衡和秩序,这种观点来源于黑格尔的偏见。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是有一个方向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者逻辑的证明能够说明布匿战争之后地中海的政治秩序,以及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就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均衡。相反,这些秩序倒最好被看成是某种非平衡状态,某种如果没有这些战争就不会产生的状态。千百年来人类都把战争看成是某种对于无序和非平衡状态的解决,这一事实作为证据存在的价值,也就跟下面这个事实是一样的,即在同一个时期中人类也决定用酒精或者其他治幻剂来治疗精神上的无序。

所有这些,都在随着海湾战争而发生的种种事件上显得无比清晰。西方的军事力量确实解放了科威特,但马上他们就不再认为他们已经由此而重建了某种形式的秩序了。相反,为了解决由这次胜利而产生出来的问题,美国——在十年之后——决定,非得再发动一次伊拉克战争不可。

敌人是不能杀的。古典战事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摧毁敌人。在一场胜利之后,如果是在过去,伟大的军事领导者会在夜间穿过被成千上万具尸体铺满的战场,而且,即使这些尸体中有半数都是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惊讶。己方士兵的死亡,会有勋章和感人的仪式来为之纪念,这样才能激发对英雄的崇拜。而敌方士兵的死亡,则会被公告天下看成是一种荣耀,而家中的平民们则应该为了每一个被消灭的敌人而感到欢愉。

与此相反,海湾战争期间却建立了这样两个原则:(1)我们的人一个都不能死,(2)对方的人也要能少杀就少杀。就敌人的死亡来说,我们见证到的是某种遮遮掩

掩的状态和某种伪善。因为,尽管有大量的伊拉克人死在了沙漠之中,但却没有人想要强调这个细节——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有趣的迹象了。无论如何,避免造成平民死亡,看起来可以称为后现代战事的一个特征。因为如果平民杀得太多,你就得冒遭受国际媒体谴责的风险。正因为如此,精确制导炸弹的使用才这么受称赞。

在因为冷战而造成的六十五年的和平之后,这样一种想法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德国火箭涂炭伦敦和盟军炸弹推平德累斯顿的时候,你还能想象有这种想法吗?

海湾战争是第一场交战国同情他们敌人的战争。至于我们自己的士兵,海湾战争则是头一个这样的冲突:它让哪怕是损失一个人看起来也是无法接受的。那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不能容忍这样的旧军事逻辑:要求国家成千上万的男儿赴死来赢得一场战斗。西方飞机的损失则被看成是极度伤痛的事件,而且,我们甚至在电视上把那些被俘士兵变成了名人,而这些人,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同意充当敌方战争宣传的传声筒。(“可怜的灵魂”,人们说,“他们是受了酷刑才这样做的”——却忘了这样一条神圣的原则:被俘士兵即使受到酷刑也不能开口。)

古典战事的逻辑会让这些人承受公众的鄙视,或者,至少,会为他们不幸的偶然戴上一层同情的面纱。可是在海湾战争中情况却完全相反,他们不仅被要求受到理解(这种理解被包裹在一种团结的温暖感觉之中),而且还得到了回报——即使不是从军方那里,他们也从媒体的好奇心那里获得了回报,因为,说到底,他们毕竟是设法活了下来。

简单来说,后现代战事变成了媒体的产品,而按照定义,媒体卖的就是快乐而不是伤痛:媒体有义务把战争的逻辑接管到自己手里并向其中注入快乐最大化原则,或者,至少是某种能提供最少牺牲的原则。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一种必须将牺牲排除在外、必须照顾到对快乐最大化原则的保证的战争,也就必须在短时间内结束。而这就是海湾战争。

科索沃的后现代战事

在科索沃战争中,所有在海湾战争中出现过的后现代战事的特征,都又一次出现了,而且是以某种更为强烈的形式重新出现。

这一次,不仅是西方记者留在了贝尔格莱德。当欧洲政府正在向塞尔维亚派

遣战机的时候,他们却在同时保持了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欧洲的电视台每小时每小时地告诉塞尔维亚人说,北约的飞机正在离开意大利在 Aviano 的基地,而塞尔维亚的代理人则在欧洲的电视屏幕上支持他们自己政府的立场。一个塞尔维亚记者,Biljana Srbjanovi,每天都要给意大利的报纸《共和国报》发来反米洛舍维奇的文章。你又怎么能轰炸这样一个城市呢:它的居民向你,他们的敌人,寄来表示友谊的信件,同时还表露出对于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敌意?

在这第二场后现代战争中,没有人应该死去,而且,无论如何也得死得比在伊拉克少。因为,塞族人之为欧洲人,并不亚于对他们进行轰炸的人;而且,说到底,欧洲也得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阿尔巴尼亚人的伤害,尽管这场冲突是因为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塞族的伤害才开始的。这场战争,无疑不是前线交锋式的,也没有一条直线来把相互敌对的派系分隔开:分隔它们的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折线。

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科索沃战争这样,在这样大的程度上以快乐最大化和牺牲最小化的原则为基础。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场战争同样必须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原因。

伊拉克之后的阿富汗

9·11 再次让战争的逻辑掉转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9·11 所标志的不是阿富汗战争的开始以及之后的伊拉克战争的开始,而是现在仍然在继续的、西方世界(更明确地说,美国)与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的对抗的开始。

如果说 9·11 是冲突的开始,那么在后现代战事的这一新的阶段,我们应该说,那种前线交锋式的战事原则现在完全消失了。甚至连那些认为这一冲突把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变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的人,也意识到无论如何这种冲突绝不再是地域性(territorial)的了。所谓流氓国家被看成是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但是恐怖主义本身却超越了地域和前线。最重要的是,它也出现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一次敌人可是真的在我们的后方了。

在海湾和科索沃冲突的时候,那些在我们自己家里活动的敌方代理人,我们都是知道的(而且事实上他们都会在电视上露面),但是到了国际恐怖主义这里,他们的力量却在于:(1)他们一直保持在不为我们所知的状态下,(2)我们的媒体不能像 Peter Arnett 在炸弹袭击下监视巴格达的生活那样监视他们,(3)这些潜在的敌人,

不仅是由那些来自别的民族背景、渗透到我们的领地上来的人所组成的,而且也可能是由我们自己的同胞伙伴所组成——从这一点上看,有可能,而且无论如何至少有可能这样设想:那些带着炭疽病菌的信封不是在那些穆斯林神风队的手上而是在那些美国本土宗派主义分子、新纳粹和其他狂热分子的手上被投递出去的。

不仅如此,媒体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它在前两场后现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前两场战争中,它们最多只是让敌对方的意见能够被听到而已。

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动都是以散播一种令人恐怖的,或者至少是令人焦虑的消息为目的的。即使当它的冲击只是处在最小的程度的时候,恐怖主义的消息也会产生一种破坏稳定的效果;而当对象是“强”象征的时候,这种对稳定的破坏性还会变得更大。本·拉登袭击双子塔的目的何在?他是要创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一个连“灾难片”导演都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灾难,他是要让这个针对西方权力的根本象征的袭击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印象,并以此来显示:即使是这个权力的最重要的圣地,也是可以被侵犯的。

现在,如果说本·拉登的目的是用这个图景来敲打世界公众意见,那么大众媒体却在这件事情上负有谈论它的义务,它有义务要展现救援行动、疏散行动,以及残缺不全的曼哈顿天际线。它们是否真的非得每天每天地重播这条新闻(至少有一个月之久),用照片、胶片,以及无穷无尽的目击者报告不断地播报这场灾难的影像?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答案。刊载着这些照片的报纸,它们的销量上升了,而那些连续不断地重播着这些胶片的电视频道,它们的收视率也上升了,公众希望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些可怕的场景,也许是为了酝酿他们的怒火,或者有时也许是出于某种潜意识中的受虐倾向。也许,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能做,但事实仍然是事实:通过这种方法,大众媒体给予了本·拉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免费传播机会,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播出那些由他所造成的图像,而且,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些图像,恐慌就在西方人中间散播开了,并且让本·拉登自己的原教旨主义支持者有了一个自豪的理由。

所以,就在大众媒体对本·拉登口诛笔伐的同时,他们也变成了他最好的盟友——感谢他们,他赢下了第一手牌。

另一方面,那种想要把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所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封锁或者减小其音量的努力,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全球信息网络要强过五角大楼,所以,它重建起了后现代战事中的这个原则:敌人在你自己的家里向你发言。在今